

“小康”史考

王 玉 波

小康社会最初是由古代儒家提出的一种理想社会模式，它以礼治为基本特征；近代维新派康有为也曾提出过“升平世”的理想社会模式，以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平等为价值取向；现代，中国共产党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将“小康”作为近期目标，“小康”成为实现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阶梯。

作者：王玉波，男，1928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小康社会思想是怎样起源和流传至今的，它的最初内容是什么，从古代到近代、现代，“小康”的内涵有哪些演变？探讨这个问题，对深化小康社会的认知大有裨益。

一、“小康”溯源

“小康”最早见之于西汉成书的《礼记·礼运》，原文是：“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是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而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功，刑仁讲让，示民有常。有不如此者，任势者去，众以为殃。是为‘小康’。”

上述这段话，《礼记·礼运》假托是孔子说的，其实是孔门后学论述的。康有为认为《礼运》是孔子弟子子游写的。^①从整篇内容看来，是西汉初儒家学者根据荀子学派的思路整理出来的。它所表述的，确系儒家的理想社会模式。

《礼运》中的“小康”，东汉学者郑玄注释为“小安”，用今天的话说，即相对安定的意思。但相对安定只是小康社会外部征态的描述，说明不了使社会相对安定、正常运行的机制。它的内在的实质性特征，用儒学语言来说，是“礼治”，即小康社会是以“礼”为整合机制的社会。根据上述《礼运》中那段话：这个社会以礼义为社会规范的基本原则，用礼来摆正君臣关系，密切父子关系，和睦兄弟关系，和好夫妇关系；用礼来建立各种制度，推崇智勇之士。这样，礼在小康社会中，既是价值判断准则，用以衡量人们的行为是否得当；又是基本教化手段，通过礼的教育，使人们不相欺诈和争夺，达到礼让的目的。也就是说，礼是小康社会整合的基本手段，是调节人际关系和解决各种矛盾的主要工具。《礼运》认为：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公旦这六位圣贤，是善于用礼治理社会的楷模，

^① 见康有为：《万木草堂口说·礼运》。

他们治理的社会，就是典型的小康社会、理想的社会模式。^①

儒家把各种社会关系归结为伦理道德关系。各种伦理道德关系中，家族伦理道德关系是最基本的伦理道德关系。还把一切社会问题，不论是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都归结为伦理道德问题。认为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关键在于解决伦理道德问题，在于提高人们的道德意识、道德修养，只有把以孝为基本准则的道德规范的“礼”内化为人们自觉的行为准则，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达到家齐、国治、天下太平。因此，儒家十分强调人的自我道德修养，认为人的价值在于人的道德水平、道德修养的高下。从而，道德修养就成了实现理想人格、人际和谐和社会安定的根本。这就是所谓以修身为本。修身要求“克己复礼”，像曾子那样“吾日三省吾身”。儒家认为人际不和、社会矛盾的发生，主要由于人有七情六欲，“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荀子·富国》）而要治理人的七情六欲，必须依靠“礼”。

《礼运》把人的情欲心理，譬喻为可以开垦的田地，“人情以为田”，把“礼”譬喻为耕田的工具，“礼义以为器”。认为“圣人所以治人七情……舍礼何以哉？”这样，“礼”成为儒家价值体系中的一个基本范畴。它既是人们外在的行为规范的礼制、礼仪，又是自我评价、自我控制、自我调节工具的“理”。《礼记·乐记》中就说：“礼也者，理也。”后来朱熹把它演绎为“天理”，把“三纲五常”说成“天理”。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各个学派为了使自己学说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更重要的是为了使自己学说由于有明确的、诱人的价值目标而为统治者接纳，纷纷设计自己的理想社会模式。

在旧的社会秩序崩溃，社会激烈动荡，兼并战争频繁，人民生活困苦渴望安定的情况下，道家老子提出一个小国寡民，没有战争，安居乐俗，甘食美服的理想社会模式；后来庄子又设计了一个精神上完全自由解放的“无君于上，无臣于下”（《庄子·至乐》）的“至德之世”、“无何有之乡”（《庄子·逍遥游》）的理想世界；墨子则宣扬建立“兼爱”、“尚同”的博爱、平等和不打仗的理想社会；法家韩非，鼓吹“法如朝露”的君主专制的“至安之世”（《韩非子·大体》）的理想社会模式；儒家创始人孔子，则主张“宪章文武”（《礼记·中庸》）建立像西周那样“郁郁乎文哉”（《论语·八佾》）的礼制完备的社会。他期望“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论语·雍也》），实现“天下有道”（《论语·季氏》）的“仁”的世界。

西汉初期的儒家，发展、完善了孔子的理想社会模式，明确和进一步阐述了“小康”、“大同”的社会理想。这也是与当时历史条件分不开的，因为秦统一六国后，把法家的“力多则人朝”（《韩非子·显学》）的暴力论和权力拜物教推向极端，厉行暴力专制。结果，人民遭受浩劫，秦王朝不过二世就被推翻。儒家学者根据自己的价值观，总结了秦王朝覆灭的历史经验，认为只有依靠“礼治”才能社会安定，于是出现了上述《礼运》中阐述的“小康”理想社会模式。

当前我国一些学者参照康有为的论点，说“小康”是儒家理想社会的初级阶段，“大同”才是儒家理想社会的高级阶段，连《辞海》中也作如是说。其实，古代的儒家，从孔子开始，就一贯和大力宣扬“小康”而不是“大同”理想社会模式。康有为也承认“夫子言礼，专言小康，不论大同”。^②这是因为，儒家价值观必然使他们强调礼治、礼教，鼓吹文武之道和

① 《礼运》中的“小康”，既有小康社会模式，也有小康历史时期的意思。

② 康有为：《万木草堂口说·礼运》。

周公之礼，从而把“小康”作为反复宣扬的理想社会。也还因为，儒家重视现世，主张“经世致用”。虽然儒家是道德至上的理想主义者，但与古代其它学派相比，还算是务实的。《论语·述而》中说：“子不语怪、力、乱、神。”甚至孔子还“罕言利与命与仁”。（《论语·子罕》）康有为解释孔子为什么言礼多于言仁时说：“天下为家，言礼多而言仁少”。^①也就是说，孔子为首的儒家，既认为“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是理想社会，又认为随历史变迁，现实已是“天下为家”、“货力为己”的时代了，所以，最实际的是实现以“礼治”为特征的小康理想社会模式。

小康理想社会模式所以流传至今，也是和儒家的小康社会理想，比道家、墨家、法家的社会理想较为实际，易于被人们接受是分不开的。在君主专制的封建社会中，不但庄子的精神绝对自由的“无何之乡”无何有的，就连老子的小国寡民、相互隔绝而又甘食美服的理想社会，也只能是个幻想。墨子在战火纷飞的时代，提出“兼爱”、“尚同”、“非攻”的社会理想，也根本无由实现。法家韩非的理想社会模式，由于崇尚暴力，实践起来必然引火烧身，秦的灭亡就是明证。只有建立在比较客观地承认“大道既隐”、“天下为家”、“货力为己”和“谋用是作”、“兵由是起”的社会现实基础上的，主张主要依靠礼治而不是暴力（但还需要军队）实现社会安定的小康社会理想，才比较切合以家为单位的自然经济下的封建社会运行机制的需要，也有一定的可操作性。所以，它不但易于被期望长治久安的封建统治阶级所接受，对长期生活在宗法文化环境下，生活贫困的民众，也有一定的诱惑力。因此，儒家的理想社会模式，自西汉起，就被封建统治阶级奉为官学，长期居于正统地位。

二、“小康”内涵的演变

小康社会思想问世后，二千多年来经历了诸多演变，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春秋战国至清代，是小康内涵在儒学框架内的充实、发展时期。

自孔子提出小康社会思想雏形后，后世的儒家不断予以补充、发展。首先，孟子设计小康社会的政治模式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的实行“仁政”、“王道”的社会。“民为贵”虽不是近代的民主主义思想，但至少表明是重视人民作用的，含有人民是社会主体的意味。其次，孟子还设想小康社会中，使人民有“恒产”。也就是说，孟子设想小康社会是一个小农经济社会，他认为小康社会之所以安定，就是由于人民有“恒产”。“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僻邪侈，无不为已。”（《孟子·滕文公上》）即在小农经济社会中，农民没有固定的田产，就难以安居乐业，会被迫颠沛流离，这必然使社会发生动乱。孟子还进一步具体地设计小康社会中农民的“恒产”是“五亩之宅”和“百亩之田”，实行井田式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相扶持”的“百姓亲睦”（《孟子·滕文公上》）的社会。他还生动地描绘小康社会人民生活蓝图为——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孟子·梁惠王上》）

这些也是对小康理想社会模式的发展。因为，尽管孟子也像一些儒家那样，把伦理道德

^① 康有为：《万木草堂口说·礼运》。

的仁义置于功利之上，反对功利主义，强调进行孝悌的道德规范的教育。但孟子重视发展生产，因此，设计小康社会中，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田地、住宅、牲畜、树木，使人民安居乐业，过着温饱甚至老者可以穿丝棉袄和有肉吃的生活。这一点非常重要。《论语·子路》中记述孔子学生樊迟向他请教种田时，孔子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用礼义取代农业生产，这至少是片面的。《礼运》中的小康社会，也主要是强调“礼义以为纪”的“礼治”。因此，不能不认为孟子使儒家的小康理想社会模式更加完善了。孟子对小康社会经济生活蓝图的描绘，也给后人以深刻的印象，使“小康”这个概念，越来越多地用在形容家庭经济状况上。从而把“小康”由相对安定演变为经济生活略为宽裕之意。

战国后期的荀子，以他自己对儒学的理解，设计了一个“隆礼至法（尊崇礼和法制完备）”（《荀子·君道》）的小康理想社会模式。这个社会是：“隆礼贵义”（《荀子·论兵》）等级制的大一统的君主专制社会。“士以上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以法数制之”（《荀子·富国》），这个社会的各种角色，都能在礼、法的规范内充分发挥自己的功能。“人君”，“以礼分施，均遍而不偏”；“人臣”，“以礼待君，忠顺而不懈”；“人父”，“宽惠而有礼”；“人子”，“敬爱而致公”；“人兄”，“慈爱而见友”；“人弟”，“敬讫而不苟”；“人夫”，“致和而不流，致临而有辨”；“人妻”，“夫有礼则柔以待听，夫无礼则恐惧而自竦”。（《荀子·君道》）“农夫以力尽田，贾以察致财，百工以巧械器，士大夫以上至于公侯莫不以仁厚知能尽官职。”（《荀子·荣辱》）这个社会是“夏不宛暘（中暑），冬不冻寒，急不伤力，缓不后时，事成功立，上下俱富”，“百姓皆爱其上，人归之如流水”（《荀子·富国》）的富裕、和谐的社会。荀子既强调礼，又重视法，使儒家的小康理想社会的运行机制更加完善了。

自西汉儒家被尊为官学之后，儒家的小康社会理想中的一些积极因素，如孟子的“民贵君轻”，《礼运》中的“有不如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不实行礼治的统治者，也要被看作是有罪过，被民众废黜）的观点被抛弃了。儒家的一些消极思想则被断章取义推向极端。更重要的是，儒学官学化之后，儒学的学术价值判断被政治价值判断所取代，儒学的学术功能被政治功能所压倒，从而沦为政治工具和禁锢人们思想的精神枷锁。儒学官学化，也使儒学成为不容置疑的终极真理，儒学被教义化、神化了，这就必然导致儒学的僵化，这使儒学自东汉后期逐渐衰落。儒学的小康社会理想，自《礼记》被钦定为“五经”之一后，再也没有什么重要发展了。

到了大一统的唐代，魏晋南北朝时期居主流地位的玄学没落，适应封建文化专制的需要，儒学又开始复兴，“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之学日益受到重视。以振兴道统自居的韩愈，在他写的《原道》中，鼓吹建立一个儒学普及，“礼、乐、刑、政”各种制度完备，人民生活富裕：“其服丝麻；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为己顺而祥”，为人“爱而公”，人人心平气和，“无所处而不当”；“生则得其情，死则得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庙焉而人鬼享”的理想社会。这对儒家小康社会理想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发展。

宋明时期的理学家，把“礼者，理也”的“理”，作为理学体系的最高范畴，并提到“天理”的高度。认为“礼”是内在的“理”的外化，“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也。”^①从而，理学家强调儒家的小康理想社会模式是一个“明天理，灭私欲”的人们道德上自我净

① 朱熹：《论语集注》卷一。

化的社会。认为这个社会，人们以修身为本，从皇帝到百姓，都能正心诚意地修身，从而使自己的行为符合体现“天理”的道德规范、名教纲常。这样，宋明理学家把儒家小康社会的“礼治”特征更加强化了。

被儒家鼓吹了二千多年的小康社会，在漫长的封建时代，始终未能实现，也根本不可能实现。这是因为儒家设计的小康理想社会模式，是以“礼治”为特征的人际关系和谐、人民生活富裕的社会。但儒家宣扬的“礼”，是宗法等级制的礼；是以孝为核心，“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为基本准则的礼；是压制个性自由、思想解放和维护封建家长制、君主专制的礼。它不但是单向、片面和扭曲人性的礼，而且正如清代学者戴震所言，还是“忍而残杀之具”^①的血淋淋的吃人的礼。因此，越是推行这种礼，就越难以使人际关系和谐，矛盾必然由淤积而爆发，社会也就不断发生周期性的震荡，广大人民也就难免饥寒。从而儒家宣扬的小康社会理想，其实际社会功能，不过是麻痹人民意志，制造人民的幻觉，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而已。

第二阶段，近代，儒家小康社会思想异化时期。

自明末期以来，随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的出现，人们主体意识逐渐觉醒，传统的儒家制订的礼制越来越受到冲击。至清末，随西方近代文化的传入和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新式学校的兴起和留学生的派遣，新型知识分子群体开始形成，他们初步用近代科学知识和新的价值观，进行反封建的启蒙宣传。尽管早期的由士大夫演变的新知识分子还没有完全割断与儒家思想联结的脐带，他们为了在托古改制名义下的变法维新，对儒家小康社会理想，也作了实质性的修正。

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学时，就提出了著名的“三世”说。他认为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据乱之世”，这是人类社会的初级阶段，其经济特征是“大农之世”，文化特征是“文教未明”，政治特征是“人主总揽事权”；第二阶段是“升平之世”，其经济特征是“大工之世”，文化特征是“渐有文教”，政治特征是“人主垂拱无为”；第三阶段是“太平之世”，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其经济特征是“大商之世”，文化特征是“远近大小若一”，“文教全备”，社会政治特征是“一切平等，贬及天子，无王可言”时代。^②

康有为认为“升平世”就是“小康”社会阶段，“太平世”就是“大同”世界阶段。^③

把康有为设计的小康社会与古代儒家设计的小康社会相比较，就会发现有以下不同：

古代儒家设计的小康社会，以“礼治”即实行以“三纲”为基本准则的礼为特征，它是人际关系不平等的社会；近代康有为设计的小康社会——“升平世”，则以“去其压抑之力，令人人自立而平等”^④为特征。所以“升平世”的“升平”，既有社会安定，也有社会平等之意。

古代儒家设计的小康社会，在政治形态上是一个“大人世及以为礼”，即实行贵族世袭制的君主专制社会；近代康有为设计的小康社会，在政治形态上是“人主垂拱无为”，即君主没有实权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君主立宪社会。

^①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

^②、^③ 见康有为《春秋董氏学》卷二、《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卷一。

^④ 康有为：《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卷一。

古代儒家设计的小康社会，是建立在历史退化论基础之上的，即认为现代不如古代，社会历史是由“天下为公”、没有盗贼、夜不闭户的“大同”社会，演变为“天下为家”的“谋用是作，兵由是起”不能不实行礼治的社会，要真正实现“小康”，必须以西周的文、武之治为榜样；近代康有为设计的小康、大同理想社会模式，则基本上建立在历史进化论基础之上，即认为社会历史越往前越进步，“每变一世，则愈进于仁。”^①先是乱世，然后进入平世，小康是由乱世向平世过渡时期，人们开始具有自主意识和自立能力。到了大同社会，则是：“远近大小若一，仁之至也”^②的时代。康有为主张通过变法维新，把封建君主专制改变为资本主义式的君主立宪制，以实现由“据乱世”向“升平世”即小康社会的演进。为此，康有为提出要学习日本的“明治维新”，^③使中国超越西方列强。

古代儒家设计的小康社会，是建立在宗法文化和西汉以来成为封建专制精神支柱的儒家价值体系基础之上的；近代康有为设计的小康社会，基本上是在近代资产阶级价值体系基础之上的，以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博爱、平等为价值取向。

上述对比可见，尽管维新派代表康有为以讲解、注释儒家的学说、经籍为名，甚至直接打着孔子旗号，宣传他设计的小康社会思想，但康有为的小康社会思想，实质是儒家小康社会思想的异化。

不过，也要看到，由于康有为长期受儒学的熏陶，西学的根基又并不深厚，他设计的小康、大同理想社会模式，是在儒学思想资料基础上，掺入近代西方资产阶级价值观构建起来的。因此，它还带有儒家思想特别是孔子仁学乃至名教纲常的印记。如康有为在《孟子微》一书中，强调小康为“乱世”，是“民智未开”、“公理未明”时期，“必待君主治之，家长育之”，还需要“君主之权，纲统一役，男女之别，名分之限。”而且，只有经过君主立宪才能实现升平之世，他固执地坚持这一阶段不能逾越，这是他的小康社会理想的消极因素，这也导致他后来反对辛亥革命，沦为保皇派。

但是，应当看到维新派康有为毕竟是在总体上前所未有地突破了儒家小康社会思想框架的，它构成我国小康社会思想演变的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即用近代资产阶级价值观对儒家小康社会思想进行具有积极意义的改造的历史阶段。

第三阶段，确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小康社会模式时期。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以后，在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80年代，邓小平提出了在2000年实现小康社会作为中国现代化在实现温饱以后的第二步发展目标。今天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正在为之奋斗的实践。这一小康社会思想，使“小康”内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第一，它不是建立在“天下为家”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经济基础之上的，而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它既不是封建社会，也不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君主立宪社会，而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民主专政的改革更加深入、开放更加扩大的社会主义社会；

第二，它既不是以儒家文化的礼治为特征，也不是以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平等为价值取向，而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

①② 康有为：《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卷一。

③ 康有为《〈日本书志〉序》。

第三，它既不是小农经济社会，也不是单纯的“大工”社会，而是以技术进步为先导的工农业与第三产业协调发展的工业化社会。它是以国营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社会；

第四，它不仅是经济较为发达，人民生活有较大提高的社会，而且是文化教育也相应发展，社会道德水平有一定提高，社会生活方式进一步文明、健康、科学，生活质量不断改善，为人的现代化和全面发展开始奠定了初步基础的社会；

第五，它不仅是经济、文化初步发达的社会，而且是经济、社会、生态环境日趋协调的社会；

第六，它仍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台阶，远不是最终的理想社会模式；

第七，与儒家和维新派的理想社会模式都是不可能实现的空想不同，我们在总结了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十多年来的经验和创造了各种条件的基础上，制订和不断完善了实现小康社会的切实可行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并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措施，因此，这个小康社会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责任编辑：王 颀

《日本卖淫问题与对策》征购启事

张萍著《日本卖淫问题与对策》已由群众出版社于1992年1月出版。日本曾有“卖淫王国”的秽称，本书根据大量的资料剖析了日本卖淫业产生的原因、各历史阶段的状况及此业在日本为何长盛不衰的原因。书中详述了日本各历史阶段妓女的构成、成长环境、生活条件、卖淫动机及卖淫收入等，其中尤以20世纪80年代为重点；同时也介绍了日本历届政府对此业所持的态度与管理措施，详述了各有关法律、规定的制度背景、具体内容及执行情况，以及日本民众对卖淫的看法及有识之士为取缔卖淫而进行的不懈努力。

欲购此书者，请将书款加10%的邮费寄至北京东长安街14号群众出版社邮购组，
邮政编码100741 开户银行：工商银行北京王府井分理处 帐号：651117—35
图书销售单位购书请按上述地址与群众出版社发行部联系， 书价5.60元。